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对《中国意识的危机》基本理论的质疑

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汇合。西方文化这一异质的外来文化进入近代中国以后开初如何遭到中国本土文化的阻挡和反抗，及至最后又如何被融入或消失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巨大“黑洞”中，一直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也唯其如此，它激起了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近些年来，海外学者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及其他论著中，也一再接触到这个问题。在解释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倾向时，他发现了就在这种表面上激烈反传统和主张“全盘西化”论的背后，却依然因袭着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他称之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想模式。这一见解，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细读林毓生的文字，发现他虽以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思想模式为所有中国近代的知识分

子所具有(他具体分析了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及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但其思想主眼,却是针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

林毓生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想模式的看法来自他对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根源及内涵所作的分析。他回顾中国近代第一、第二代知识分子反传统思想的起因说,中国传统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强调人类意识的功能。对于‘心’的这种功能的强调可以一直追溯到孟子、荀子,以后在宋明儒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明清时期,即使出现了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戴震等,表面上持反知主义的主张,而其思想模式仍无一不是传统的主知主义。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提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认为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尽管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已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内容,但其思想模式依然与传统的思想模式注重思想的优先性一脉相承。这里首先值得提出的是,林毓生所谈到的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及第一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往往包括有持各种思想和主张的知识分子。他没有说明,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主张其他思想,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分子,在思想模式上是否有区别或完全相同。

其次,审视一下林毓生书中提出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想模式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他似乎是将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倾向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等同了起来。《中国意识的危机》对中国近代第一、二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思想作了勾划,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写道:“在陈独秀和胡适看来,没有必要对中国传统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研究。他们从唯理论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出发,认为受到指责的中国传统是不值得珍视的。根据这种

形式主义的论断，中国传统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切文化中都具有的性质而已，它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国性质既不能提供解释，又未有所贡献。”^① 这里姑且承认林毓生对陈独秀、胡适及其他一些近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思想的分析都能成立，但是，到底反传统思想为什么会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思想模式”联系起来，其间的因果关系仍是不明确的。也许，林书的要义是指出这么一个事实：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无论表面上反传统也罢，维护传统思想也罢，骨子里无一不受思想（观念）优先这一意识的支配。

这里，林毓生混淆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所言’与‘所为’。虽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常常有强调思想的重要性、提倡伦理、道德革命的言论，但这些言论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何况，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就所言上说，严复就提出民力、民智、民德并重 至于革命政治，至少从严复开始就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在五四及五四以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难的工作，就是如何通过和平的手段促使当权者进行政治与社会的改革。这种和平的方式只与暴力的方式相反对，而绝不限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从维新运动时期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绝非纯然“坐而论道”的人物，他们除针对时弊发为议论之外，还投身于政治与社会实践活动，力图使其观念及理想现实化。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类型中，由于中国自由主义者较之其他思想分子有其独特的信条与信念，他们介入政治的方式、从事社会活动的范围领域自然同持其他

^①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思想，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显示出差别，但无论如何，真正视“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属罕见。

导致林毓生得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看法的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他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时，过多地注意到这些知识分子提倡和鼓吹思想、伦理和道德革命（本来伦理、道德与思想并不是一回事）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活动的其他方面。例如，他提到胡适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说早在1906年，胡适在上海公学读书时，开始创办一个刊物叫《竞业旬刊》，其宗旨根据胡适自述就是“向大众灌输新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倾向与胡适一生相始终。二是林毓生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严复直到胡适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文字予以了充分的重视，而由此推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主张“有机式地吸收”“现代文明之精华”。^①但既然是主张“有机式地吸收”，其西洋文化的意义决不只限于“思想文化”，它乃包括西方的科技、工业、经济、政制、学术、习俗和意识形态，这怎么可以得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视思想、文化的改造为万能”的这一说法呢？

然而，我们在这里指出林书中一些基本见解上存在的缺陷，并无意推翻书中所有的结论。应该说，林毓生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包括中国自由主义分子）所作的观察是深入的，尤其可贵的是，他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全盘性反传统的思想与传统思想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关联，这不能不是一个难得的发现。此外，他对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分析，非对于中

^①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52页。

国传统思想同时对于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否则难寻其底蕴。就这个意义上说，了解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冲突与汇合，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处境况的了解；反过来，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现实困境的探索与分析，将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之力度及曲折提供具体的说明。

二、西方自由主义成长的内部机制

在西方，人们对“自由主义”一词赋予丰富的涵义。现在用它来指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某一种社会思潮，其内涵除原有的含义之外，又由于打上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印记而显得更加繁复。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碰撞的产儿，其思想源头主要来自西方。因此，要了解中国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先必须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生和发展有一通观的了解。

“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自由”(Liberty)有联系又有区别。自由为“独立、自主、无阻碍”之意。海耶克释英文“Liberty”一词的含义说，它描述的是一种没有特殊的阻碍——其他人的强制的状态。而“自由主义者”(Liberal)则由拉丁文Liberalis转化而来，它包括有尊重个体自由、思想宽容、有高尚的修养，等等。故“自由主义者”除信奉自由为一种社会理想之外，还兼有个人伦理道德上的意义，其核心思想是宽容与追求思想自由。由Liberalis还派生出Liberalism(自由主义)，它用以指称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产生，以后经过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系列的主张，其内容包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政治上的有限政治与法治、社会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历史观上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m)等等。其著名的思想人物有洛克、亚当·斯密、斯

宾塞、穆勒、杜威以及当代的海耶克、波普尔、罗尔斯,等等。

应该指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虽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至19世纪而大张其帜,其思想源头却不自英国革命起。早在古希腊被称为‘智者派’的怀疑论哲学家那里,就有关于人的普遍平等、国家基于契约而产生以及法(Law)的唯一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安全不受侵犯诸如此类的观念;在雅典式的城邦政治中,体现了古希腊人追求民主政体的自由意识。罗马时代建立了基于早期个人自由原则的民法制度,出现了像李维(Livy)、塔西陀(Tacitus)、西塞罗(Cicero)这样一批维护罗马法的自由精神的历史学家和演说家。到了中世纪,虽然民主政体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复存在,宗教宽容的精神也由于基督教之成为国教而业已消失,但作为自由主义之核心观念的个体主义精神却溶入于基督教而得以继续延续。

使西方古代自由主义精神得以复活的是中世纪后期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展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要求从教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鼓吹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其结果使个体主义大大得到张扬。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文艺复兴运动作了这样的评述:“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创造出一个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而且个人天才也能够在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就绝迹了的自由状况下蓬勃生长。”^①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热情讴歌人的潜力和才能,他们除继承古希腊的传统,将自由界定为不受外来干涉和反对暴君的侵害之外,还强调自由的政体就是“使每个公民都有同等机会,能够积极地参与政府事务”,而这反过来又保证了“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尽最大可能维护全体公民的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页。

自由和平等”即使像马基雅弗利这样一位由于写了《君主论》而被目为“替专制政体辩护”的人物，也只是反对当时关于政治自由的一些流行见解，而没有将政治自由从根本上抛弃。他提出，在创立一个共和国时，所有立法者的首要目标都应是预见出维护自由所需的全部法律。他还宣称：“民治的政权”比“君主权”优越，民众忘恩负义的现象“比君主要少得多”，等等。可见，自由思想，无论在伦理道德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成为当时的风潮。

16世纪初由马丁·路德发难，后来席卷整个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发生了重大影响。1517年万圣节前夕，德人路德在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否认教会拥有司法权，否认教会是指导和管理基督徒生活的权威，否认教会干预世俗事务的任何权力要求。虽然就思想认识上，路德的哲学观是中古式的；从哲学上讲，宗教改革后的一个世纪是不毛的世纪，但宗教改革造成的后果却主要是世俗性的而非纯粹宗教性质的。其原因在于，不管任何国家的君主，只要信奉新教，路德就承认他是本国的宗教首脑。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荷兰的新教君主们都取同样的态度。这导致了王权扩张的趋势。但是对于宗教改革的个人主义各方面都认真看待的新教徒们不愿屈服于教皇，也同样不甘心屈服于国王，于是在王权与教会之间，不同教派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战争。战争持续了30年，闹得人疲惫不堪。最后人们深信无论那一教派都不可能获全胜，统一教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这终于导致扩大了甚至在根本问题上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宗教宽容信念也滋长起来。这种信念发展成为18、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源泉。

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是以近代科学的出现为标志的。

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一书，预示着科学革命的即将

到来。从17世纪开始，西方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科学与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时代。以天文学和动力学为例，出现了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这样一些伟大人物。在光学、热学、磁学、化学、医学、地质学等等部门，都有一系列惊人的发现。在纯数学方面，奈波尔于1614年公布了对数发明，笛卡儿发现了坐标几何，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等等。科学的进步在人类面前展示出关于世界的新图景，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工具，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提倡怀疑和思想自由，反对盲从权威以及讲求实效的功利主义精神。在17世纪初，科学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基本目的是“增进人类财富”，这种功利主义的调子对后来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洛克一再提到增进“生活的巨大便利”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价值。可以认为，洛克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标准上的。

科学的成功导致一种关于进步的观念。培根写道：“世界的古老时代应该算是真正的古代，而这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古人生活在那个早期时代的特征。”^①他相信，通过运用科学与理性，可以增进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从而增进人类的舒适与快乐。这种功利主义与进步观的结合，直接成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信念之一：社会向善论的根源。

与科学革命几乎接踵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它终于彻底地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面貌。工业革命带来的根本性转变有两点：它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它同时还造就了一个要变革旧制度的新阶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前身是商人

^①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阶层。早在14、15世纪，由于海外殖民地的扩大和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的商人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但他们的力量还未有强大到足以与贵族、国王分庭抗礼的程度。H·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写道：“事实上，14、15世纪的资本家，不管他们的出身有何不同，都不得不与诸侯们发生关系，而与诸侯的利益完全一致。一方面，诸侯如不求助于金融家，就无法应付公共的或私人的开销。另一方面，大商人、银行家、船主们需仰仗诸侯的保护来对付城市的自我主义的镇压、城市的叛乱、保护商品与货币的流通。当那些‘有东西可以损失的人’愈受社会动乱或共产运动的威胁时，他们就愈投入王室权力的怀抱中，并以此作为他们唯一的避难所。甚至连工匠们受到帮工的威胁时，也求助于王室，因为王室是秩序的保障者。”^①但是自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时候，英国的中产阶级不仅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与经济命脉，在议会中也占有多数。他们开始以“议会斗争”的形式要求摆脱国王的控制而分享政权。1640年，以中产阶级掌握的议会同国王查理一世的冲突为导火线，爆发了长达40年的英国革命。这场革命最后以中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来说，英国革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由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联合发动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最终确立了法治的国会统治形式，强调了公民有结社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等等。英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由著名的辉格党人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作了总结。

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18世纪后半叶爆发了美国革命和法

① H·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3—194页。

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的领导人物杰弗逊等人熟悉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著作，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将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加以了发展。面对与英国迥然不同的传统和背景，法国大革命采取了激烈对抗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除孟德斯鸠之外，大多数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解释英国革命的经验时，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提出，他们信仰理性的力量，将以往近一千年的历史称之为“黑暗时代”，要求借理性之光驱除黑暗，建立理性的王国。这导致他们产生思想优先的倾向，并对建立大众式的‘民主政治’寄托了太多的幻想。

与英国“光荣革命”后在辉格党人的庇护下开创了一个长期的社会与政治稳定时期不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社会的严重动荡和混乱。这促使坚持自由主义理想的人士，如贡斯当(B. Constant)等人对自由主义从理论上重加反省。他们致力于区分为保障个人独立领域的自由与参与政务的自由，认为个人自由与大众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这批对大众政治进行理论反思的著名人物中有托克维尔(A. Tocquville)。与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极权民主’的担忧不同，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担心的是以大众民主政治面孔出现的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无论如何，19世纪的欧洲是自由主义鼎盛的时代。《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写道：“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在其历史进程中达到了顶峰，它促使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产生了成文法和议会，扩大了选举权，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要保障人身自由。”^①但就当自由主义在社会与政治实践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之际，其思想也产生了变形——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而取得主流地位。功利主义型的

①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国家政策的干预，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求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求得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的趋于一致。这表明在宪政已经确立的欧洲这些国家中，自由主义面对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限制政府权限，而是如何通过增进国家的权力以解决诸如扩大劳动就业、关税改革、社会保险等社会问题。

以上对西方自由主义历史的回顾表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是由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促成的，且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1. 在促成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出现的诸种因素中，宗教的因素值得重视，它构成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特有的文化背景。以英国自由主义为例，它的个人自由、人民主权观念的形成，同基督教义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有密切的关联，因之，英国革命开始时采取了宗教革命的形式。

2.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注重思想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传统。以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为例，它除了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及基督教义中获取自由主义的思想养料之外，其‘法治’观念，实根植于英国近代以前一直根深蒂固地遵守‘习惯法’的传统。

3.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是按照某些理念和思想模型演绎而来，而是将传统的或现存的一些观念在运用于实际的过程中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的实际情况。这方面可举洛克提出“论宽容”的原则为例子。

4.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十分繁杂，流派甚至且在不民的历史阶段。其关心的中心问题及讨论的重点不同。中国近代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介绍既有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亦有大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有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亦有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型的自由主义主。

三、格式塔心理与西方思潮的输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来被称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高涨期。在解释新文化运动的成因时，梁后超的一段话值得注意。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后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20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20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①这段话写于1923年，而且出自曾经是一位自由

^①梁后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梁后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主义者的梁启超之口，显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它告诉我们：西方文明，包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输入，是建立在近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的深刻反省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在西方经济、政治、军事的压力下，中国人感到要自强，唯有取法西方。于是整个西方文化，从器皿文化到观念文化，一古脑儿被视为挽救中国危机的药方被介绍到中国。

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下：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是19世纪欧洲的三大社会思潮，这三种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差异巨大。其中，民族主义强调国家至上的原则，认为个体从属于群体，个体只有作为国家中一分子而存在才显示其价值。社会主义强调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并认为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才能实现。自由主义则提倡个体本位和重视个体自由，并认为国家的职能旨在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在政治理论上，与其说它关心的是通过政府来协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毋宁说它更关心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政府对个体自由的侵犯。因此，它主张有限政府的原则，要求以严格的‘法治’（the rule of law）形式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西方近代这三大社会思潮在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差别如此之大，如果说挽救民族危机、追求国家富强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他们在介绍、传播西方文化于中国之时，理应选择民族主义而不是其他。但事实上，与民族主义尖锐对立的西方自由主义之传入中国，却比民族主义更早，至少，在梁启超所说的“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第二期，就有严复等人以介绍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到中国为己任了。这一现象该何以解释？

看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明时具有一种“格式

塔心理’这种‘格式塔心理’在西方压力增大而又急欲学习西方文明时更有强化之势。所谓“格式塔心理”，是指将认知对象视为一有机的整体，对象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分割。在这种认知心理的支配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为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应当采取‘全盘式输入’的办法，即不单纯引进西方的科学、制造和政制，还包括接纳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19世纪70年代，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国势鼎盛，自由主义风行。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格式塔心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严复，在观察英国的富强之道时，很自然会将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同英国的国力联系起来，并将它作为富强之道介绍到中国来。20世纪初直到二次大战之前，一些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返国以后，深受美国经济物质生活的富裕及国力上升之鼓舞，也试图将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同样也可以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格式塔心理’来说明。

“格式塔心理”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还是近代化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世界经验时普遍出现的历史现象。除近代中国之外，它还发生在日本、印度、土耳其等许多非西方国家。世界近现代史上，非西方国家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目睹西方的富强而谋求自强之道，在格式塔的心理及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它们必然要达到这么一个阶段，即提出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所有方面全面地取法和模仿西方。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其各部分之间有内在的关联；西方的经济成功不纯然是经济的因素造成的，还包括西方社会的诸种因素，例如思想文化及价值观的因素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全方位学习西方并不为非。但在这种“格式塔心理”的支配下学习西方经验时同时亦可能寓藏有危险。因为它容易导致将西方的文化凝固化和概念化。殊不知西方的思想文化纵然同西方的富强有关，这些

思想文化却无法简单地移植，更不能将它视为一成不变的教义或教条。原因在于西方近代文化离不开西方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是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化的演化。但从格式塔心理出发，很容易将西方的社会系统视为一静止的结构，将西方某一时时期流行的思想观念误认为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因子或动力，而没有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往往是前一阶段社会种种因素，包括思想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严复为例，他误以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富强局面是以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型的自由主义造成的，却忽视了为19世纪的英国文明奠定了基础的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第二节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期待’

“期待”原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等待和希望看到有某种事物在未来某个时刻出现的心理状态。如果说社会是无数社会成员的集合，那么“社会期待”本该指某一历史阶段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理状态。但社会作为综合组织结构并不可化约为无数个体的简单相加。在社会组织中，“社会期待”常常是通过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知识阶层集中地反映和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心理的探测应该着眼于社会的思想知识界，尤其是其中的敏感地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我们常可发现学术思想同社会政治生活的密切相依关系：政治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学术空气的转向；反过来，学术风气的转移，也常常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这样，中国学术思潮及治学风尚的变化，往往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和镜子。对甲午战争以前

中国学术思想的考察将会使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思想在维新运动以后开始在中国流播决非偶然的事，它迎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某种“社会期待”。

1. 汉宋调和论的提出和“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生。清朝以乾嘉时期为代表，堪称汉学——训诂考据之学异常发达的时代。梁启超谈到汉学的成因说，明亡以后，学者们痛定思痛，将明朝复亡的原因归之于陆王心学的空疏，于是起而提倡注重名物考据的“实学”。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知识分子的种族意识及反满情绪而大兴文字狱，大多数读书人为避文网而转向远离政治的文字、音韵、版本校勘之学，这也是导致汉学兴起的一个原因。可见，清代汉学的崛起实可以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寻到答案。汉学开始时在民间流传，到了乾嘉时期终于有风靡天下之势。但朝廷从政治角度考虑主要还是提倡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义理的程朱理学。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汉学、宋学相互攻讦若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但从嘉庆末年起，情况有所改变。当时出现一股势力，无论从汉学阵营还是宋学营垒中都开始放弃独尊一家的口号而主张汉宋调和。汉学家胡培翬说：“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①原来治宋学的刘开在《学论》中也提出“兼采汉儒，而不欲偏废。”^②这种汉宋调和论的提出，实是传统旧学出现危机的反映。它说明，相当一部分学者已感觉到再按原来的治学方法走下去，已无法应付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试图改弦易辙。

汉宋调和论的产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主张汉宋调和论的大多是关心时局的一些知识分子，希望借学术

^① 《研六室文钞》，卷五。

^② 《刘孟涂文集》，卷二。

达到济世和救世的目的，所以强调事功和经世致用。如著名汉学家程恩泽提出：“通训诂，明义理”；以为留心理义，推之事功，为有用之学”。^①理学家唐鉴也提出：“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②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打破以往将“学”与“政”区分为二的学风，强调“学问经济无二事”，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这时候的“学术”内容已不限于传统的经学，还包括史学、舆地、朝掌国故等等。由于当时边警日深及内政面临困难，研究边疆地理及本朝掌故的著作较以往骤然增多。这当中著名者有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等等。

2. 今文经学的崛起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抬头。与汉宋调和论和经世致用之学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今文学派的思潮。今文学派推崇《公羊》之学，讲求“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相比，无疑在传统的学术框架之内更易于表达对时政的看法。也唯其如此，在清代盛行文字狱的时期它一直处于潜伏状态。到了嘉庆末年，有刘逢禄出，他上继庄存与，下启龚自珍，终于开创了今文经学复兴的局面。今文经学如同汉宋调和论一样，本是传统学术走到山穷水尽地步谋求自救的一种表现，但较之汉宋调和论，它在学术性格上却带有更多的异端色彩和叛逆性。钱穆评论晚清今文经学的开山庄存与说：“庄氏为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

① 《与湘皋书》，见邓显鹤：《南村草堂文集》，卷九附录。

② 《国朝学案小识》。